

【语言学研究】

文革修辞格三题

——文革修辞研究之十

刁晏斌^①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本文选取了在文革期间有比较高的使用频率的三种修辞格, 即仿词、借代和节缩, 对其特点和一般使用情况等进行了考察和说明。

关键词: 文革; 语言; 修辞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 (2007) 06-0059-04

“文革语言”这一称名出现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 但相关的研究却一直没能充分地展开, 我们认为, 对文革时期语言及语言运用情况的研究意义重大。这方面的研究可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进行, 而修辞应该是其中一个很好的方面和角度。所以,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做“文革修辞”的系列研究, 主要是由文革期间一些高频使用的辞格入手, 进行考察和分析, 本文中我们将讨论三种辞格。

一、仿词

仿词是更换已有词语的某个语素或词, 而仿造出新词语的一种修辞方式, 它的上位辞格是“仿拟”, 即对现成的词、语、句、篇的模仿使用^{[1]49}。文革期间, 对句或篇的仿拟似乎不多, 而对已有词语的仿拟却比较多见, 并且能够反映此期词语及其使用的某些特点。

徐国珍在词的范围内把仿拟分为修辞性仿拟和构词性仿拟, 前者是“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为目的的仿拟现象”, 而后者则是“以满足用词需要为目的的仿拟现象”^{[2]54-55}。

其实, 两种功能和目的的仿词有时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或者说, 在特别明显的两者之间, 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中间状态。这是因为:

第一, 无论是哪一种仿词, 它们的产生手段和构成机制都是相同的, 即都是通过对已有词语的“保留”和“替换”来实现的;

第二, 二者的起点都是偶然的使用, 所以在“初始”状态, 二者的属性有时并不容易判断;

第三, 修辞的仿词可以发展为构词的仿词, 当前者获得了一定的复现率, 最终有了稳定的意义, 可以和其他词一样正常地独立使用, 它也就成为后者了。

我们认为, 在文革期间, 仿词的这一中间状态表现得比较明显和突出。所以, 我们主要就从这个角度来展开讨论。

在讨论之前, 我们先简单地看一下边界清楚的那一部分修辞性仿词和构词性仿词。

构词性的仿词之所以会产生, 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不断涌现的新事物、不断产生的新情况、不断生成的新观念使原先的词语仓库已无法满足人们的表达需求, 于是, 具有方便快捷的生成特点的仿拟格就常常被人用作了创造新词的手段”^{[2]55}。这一表述当然也适合文革期间的实际, 所以此期构词性的仿词比较多见, 并且经常是“批量”产生, 因而具有一定的词族性, 而这也成了此期词语及其使用的特点之一。比如, 像“革命(革)、红(色)、黑、一论”等, 都属于较为常用的构词成

① 收稿日期: 2007-10-26

作者简介: 刁晏斌 (1959-), 男, 山东烟台人, 文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 985 工程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由其本人在国内外首次提出的“现代汉语史”的研究。

分, 而由它们参与构成的词, 大都属于此类。

至于严格意义上的修辞性仿词, 似乎不多。

文革期间, 更多的仿词是介于修辞仿词与构词仿词之间, 或者说是二者交织在一起的仿词形式。以下我们就以“X 字号”为例来作一分析。

“字号”义指商店的名称, 有时也可以指商店(见《现代汉语词典》), 在使用中, 此词有时会义有所转(主要是由具体到抽象), 例如(本文全部例句均取自《人民日报》, 以下为了节省篇幅, 我们只标出版日期):

(1) 在竞赛运动中, 南宫支公司门市部售货员转变了过去的“官字号”作风, 热情招待顾客。(1951. 11. 20)

(2) 这些材料不但有力地证明胡风集团是个反革命集团……隶属于蒋介石匪帮的一个反革命组织。当然, 不管属于什么字号, 凡是反革命, 我们就要坚决地予以镇压。(1955. 6. 11)

在此基础上, 就产生了我们所讨论的“X 字号”形式, 例如:

(3)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揭露出来之后, 我们才了解到胡风等人的娘家在什么地方——原来他们是国民党匪帮双料“中”字号(“中统”和“中美合作所”)的走狗。(1955. 6. 15)

(4)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已经大大缩小了; 在这个世界市场上, 除了“德”字号, 还有美国和日本等等, 参加了竞争。(1957. 3. 25)

文革初期, 出现了一个“‘保’字号”, 指性质上属于保守派的组织或个人, 以下是见于《人民日报》的最早用例:

(5) 那些“保”字号的反动组织也蠢蠢欲动, 他们吵吵嚷嚷地叫喊什么“要夺权!”那些死保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 就是要保他们自己从前的小乌纱帽。(1967. 2. 5)

此后, 这就成了一种有一定能产性的形式, 我们所见, 有以下一些:

“修”字号、“造”字号、“帝”字号、“资”字号、“长”字号(即带“长”的人, 如厂长、局长等)、“牛”字号(指牛鬼蛇神)、“万”字号(万里挑一的人)、“大”字号(大学生)、“中”字号(中学生)、“工”字号(工人)、“叛”字号(叛徒)把以上所说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

第一, “‘保’字号”等系对“‘X’字号”的

模仿, 所以属于仿词;

第二, 这一仿词形式的数量较多, 因而有了一定的词族性, 另外, 其中个别的还有一定的复现率, 如“‘保’字号”“‘修’字号”等, 就这两点来说, 与构词的仿词比较接近;

第三, 但是就大多数例词来说, 复现率是极低的, 有的甚至只是个别的偶发形式, 因而具有临时性, 就这一点来说, 它们只能划入修辞仿词的范围内。

类似的再如由“军阀”而仿造的“学阀、党阀”, 由“老乡”等仿造的“老造(造反派)、老保(保皇派)”等。

即使一些没有词族性的个别仿词, 大致也有上述特点。比如“促退派”, 显系对“促进派”的仿拟, 所以最经常在以下的语境中出现:

(6) 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向群众学习, 做革命潮流的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1969. 8. 10)

按, 如果“促退派”只能出现在与“促进派”对比的语境中, 那么它始终就只能是一个修辞性的仿词,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词”, 然而, 我们也看到了离开了上述语境而独立使用的例子:

(7) 鲁迅说这些人不象是批评家, 而只是“不平家”。这样的“不平家”是促退派, 站在新生事物的对立面, 万不可当。(1973. 4. 15)

这就很像是一个已经取得“词籍”的词了, 但是, 这样的例子非常少, 在 1966—1976 这 10 年的《人民日报》中仅有 1 例, 所以还不足以得出上述结论来。

二、借代

借代也叫“换名”, 是不直说出某事物的名称或动作行为, 而是借用与之密切相关的名称或说法来替代本体的一种修辞方式。

文革时期, 借代的使用有以下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一是几乎只限于在“政治”和“革命”的范围内使用, 因而往往有或褒或贬的比较明显甚至是强烈的感情色彩。比如, 贬义类的“黑”词族中的“黑线人物”(指站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一边的人)、“黑组织”(由坏人组成的组织)、“黑书”(政治内容反动的书); 褒义类的“红”词族有“红宝书”“红五卷”(毛泽东著作)、“红司令”(毛泽东)等。

此外, 像“主课、大是大非、红外围、中国

的赫鲁晓夫、广阔天地、牛棚、新沙皇、党票、银球、银针”等，基本也都可以划入“政治”和“革命”的范围内，而以下我们要讨论的借代形式基本也都属于此类。

二是有较多的动词性借代形式。一般讨论借代的论著，都只谈“名称”的借代，这一点，从“换名”的别称也可以看出来。姚殿芳、潘兆明说“借代中绝大多数是名词代替名词”^{[3]394}，但是他们也没有讨论这“绝大多数”以外的其他情况。我们所见，只有史尘封在“用具体代抽象”中，举了几个动词性的例子，如以“摧眉折腰”替代“阿谀奉承”，以“挺腰子”替代“耍态度”等^{[4]346}。

以下就是此期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些动词性借代形式：

打招呼：预先将自己的打算、意图等告诉别人，让别人有思想准备，并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图办事。

靠边站：被停职反省或剥夺了工作权力。

受冲击：成为运动的对象，受到运动的打击。

挂起来：指对某干部暂时不安排工作，或对某人暂时不作政治结论。

给出路：指出身不好的人或犯了错误的人，如与家庭划清界线、思想改造好了，仍给予他一定的正常待遇，如安排工作等。

亮相：公开表态，亮明观点。

其他的再如“大喊大叫、捞稻草、捞油水、亮相、面对面、抛出来、自绝于人民、入另册、受冲击、站队、站错队、过线、纳新、吃商品粮、吹风、轧马路”等。

以下，我们举几个实际的用例。

(8) 让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滚蛋吧，让那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靠边站吧！(1967. 1. 15)

(9) 有的人就怕亮相，甚至明摆着的错误也不承认，更不用说挖灵魂深处肮脏的东西了。(1967. 4. 12)

(10)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是我们大队干部中群众意见最多，受冲击最早的一个。(1968. 2. 25)

(11) 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1968. 9. 5)

(12) 他们研究重要问题，总是会前向委员们打招呼，让大家早作思想准备。(1969. 1. 24)

(13) 这时有人就认为，这个人中毒太深，不可救药，干脆把他挂起来算了。(1969. 6. 17)

以上各例中的借代形式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复现率，所以在几部文革语言词典中都收为词条，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偶然性的用例，再如：

(14) 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过程中，一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自己梳装打扮起来，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1967. 4. 18)

按，我们认为，这里的“梳装打扮”虽接近于比喻，但理解成借代可能更直接、更自然一些。

与“换名”不同，这一类借代通常是用一个现成的动词或一个简单的动词性结构来替代一个比较复杂的表述形式，甚至一个形式对应几个不同的表述形式，这样在实际的使用中，也就有了几个不同的意义。

比如“抛出来”，《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熊忠武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年)中的释义是“为了达到某目的而把某人作为牺牲品，或把某材料公诸于世”，以上第二义相当多见，而第一义也时有所见。这里各举一例：

(15) 这个厂里原有一个领导干部，由于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民愤较大，当时还窃据一部分权力的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便利用这个干部的错误大耍阴谋，把他抛出来定为“走资派”打倒。(1969. 2. 24)

(16) 《修养》一书，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三九年抛出来的。(1967. 4. 3)

这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对一的关系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再如“打招呼”，前边我们已经举过一例，而以下一例与辞典的释义和例(12)所表达的意思又略有不同：

(17) 苏修叛徒集团在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马上向约翰逊打招呼，这就活生生地勾划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1968. 8. 23)

三、节缩

节缩是把较长的词语精减压缩的一种修辞方式。文革时期，由节缩而形成的各种简缩形式相当常用，也显示了一些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动词性并列简缩形式的较多使用。

文革期间，有一些在其他各阶段较少见到的动词性并列简缩形式，数量虽然也不是特别多，但是

有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因而可以看作此期简缩形式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样的形式如“斗批改、斗批走、斗批散、打砸抢、打砸抢抓抄、上管改、关管压、管卡压、揭批查、批斗、揪斗、打斗”等。

“斗批改”在1966—197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一共有984例,按《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它的意思在不同的阶段有所变化,开始时是指《十二条》中指出的“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到党的“九大”以后,按“毛主席语录”,它是指“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例如:

(18)要把大批判运动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1967.5.23)

“斗批走”则是“先斗争,再批判,最后走人”的简称(见周荐主编《“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韩国中文出版社1997年),与之意思相近的还有“斗批散”。很显然,这里的“斗批”与“斗批改”中的“斗批”又有所不同。我们来看以下的例子:

(19)有的同志说:“我过去想斗批走,斗批散。现在,一心想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1967.10.30)

(20)我一贯指手划脚,教育别人;这回自己

受了批判,就经受不了了,什么“反正不行了”,“斗批走”之类的思想都冒出来了。“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斗批改”,只能是“改”。“斗批走”,实质上还是对群众的批判、斗争有抵触(1967.11.12)

按,此例显示,“斗批改”还有上引释义之外的第三个意思:斗争、批判、改正。

以下一例对“上管改”的意思说得很清楚:

(21)旧学校引诱学生埋头读书,不关心国家大事,实行关、卡、压,……现在的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为了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我们在全院建立了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各级组织。(1976.2.14)

三音节及以上的动词简缩形式,在使用中基本是指称用法,这一点,通过以上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特别是例(21)中二者的对比最为明显;二音节的简缩形式仍然保留了原词性,但是在用法上可能有拓展,比如“批斗”与其原形“批判斗争”的词性一致,但是后者没有及物动词的用法,而前者这样的用法却很常见,例如:

(22)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痛批了中国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一系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并且结合本单位阶级斗争实际,狠狠批斗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8.6.14)

参考文献:

- [1] 王德春·修辞学词典 [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2] 徐国珍·仿拟研究 [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3] 姚殿芳,潘兆明·实用汉语修辞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 史尘封·汉语古今修辞格通编 [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王芳)

Three Topics on Speech Figure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DIAO Yan-b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ree speech figures such as nonce words, metonymy and abbreviation that were frequently us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are discussed. Their features and usages are investigated and explained.

Key word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language; rhetoric